

# 儒家人文传统与当代两岸大学伦理教育

张 亚 群

20 世纪末叶,全球性问题的凸现迫使人们寻求共识,建立普遍可以接受的道德规范。最近几年海峡两岸有关道德文化问题的地区性学术研讨会明显增多。1997 年底在台北召开第一届两岸伦理学术研讨会,探讨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1998 年 7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伦理学处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区域专家会议,主题为“普遍伦理:中国伦理传统的视角”。同年 11 月由美国太平洋地区发展与教育协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宗教·道德·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凡此无不表明,人文关怀与道德重建正成为世纪转换中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大学校园伦理建设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校园伦理主要是指一种特定的社会规范,包括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以及教师与家长之间应维持的适当关系。良好的校园伦理关系有利于大学教育目标的实现。面临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的挑战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我们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大学校园伦理?如何建立?这些都是当代大学教育必须回应的现实问题。解决问题之道,离不开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同时也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对校园伦理作出变革与创新。本文旨在通过考察儒家人文传统的伦理教育思想资源,剖析当今大学伦理教育的时代要求,从传统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中,探寻两岸大学校园伦理建设的共同价值取向。

## 儒家伦理教育思想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古代思想流派中,以伦理道德观念为理论核心的儒家学说独树一帜。从先秦原始儒学,到两汉经学,再到宋明理学,儒学理论体系不断演变,但其重视道德教育和修身养性的传统则一脉相承。孔子毕生办私学,培养仁人君子,开儒家道德教育之先河。其后历代儒者无不以探索道德理想并付诸教育实践为己任,从而丰富了儒家德育思想的内涵。

回顾历史,儒家伦理教育思想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一) 认为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始于人性,本性观构成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儒家创始人孔子,虽没有论说人性之善恶,但对人性之理解已颇为深刻,这成为他整个教育思想的出发点。《论语·阳货》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说明人的天性原来是相近

似的,后来的相异是由教育与环境所造成,即习善从善,习恶从恶。这与近代教育学关于遗传、环境、教育关系的科学论断不谋而合。从人性可塑这一前提出发,孔子充分肯定道德教育在人的培养中的决定作用,提出“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认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从而确立了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

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发展了他的人性说,提出人性本善,它表现在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设立学校的目的就在于“明人伦”,教育的功能是扩充人性本有的善端,开启道德之自觉意识。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反,先秦儒家思想集大成者荀子则提出了人性本恶的观点,并由此推论出道德教育的起源。认为:“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荀子·性恶》)。他还进一步指出,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是因为“人能群”,“有义”;相反,“禽兽有知而无义”(《荀子·王制》)。因此,必须通过“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的道德教育,达到“化性起伪”的目的。先秦时期形成的“性善”说与“性恶”论,都推导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的结论,对后世儒家德育理论与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积淀为中国人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

(二)儒家以“人道”为中心,确立做人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与规范,使之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所谓“人道”,是关于人事、人伦和处世的法则。儒家的人道就是仁义之道。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提出他的伦理教育思想总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是儒家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一切生活行为的基本原则。“道”见之于具体行动就是“德”,而“仁”是“德”的最高准则。“仁”的主要内容就是“爱人”,即重视人的作用和人的内心修养;以“仁爱”原则协调人际关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游于艺”是要求弟子掌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实现仁道理想服务。其后,孟子提出以“心”释“仁”和以“义”行“仁”的原则,开创儒家道德教育的“心、性”之学。荀子又扩充“礼”的内涵,使儒家道德教育融入法家思想的成分。

从“人道”出发,儒家德育内容还包括多种道德项目,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是“五伦”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此外,孝、悌、忠、恕、智、勇、慈、恭、利、欲、廉、耻、俭、惠、慎、直、敏等都是儒家辨析的道德观念。它们构成品评人物的依据。例如,俭与奢、谦与骄、施与吝是不同的品德标准。《论语·述而》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以此评价人物,“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颜氏家训·治家》阐释说:“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今有施则奢,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这就说明,儒家道德规范讲的都是世事人伦之理,儒家的道德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世俗教育,这与西方宗教神学的道德教育传统形成鲜明对比。

(三) 在伦理教育过程中, 儒家突出教师的特殊作用, 主张“严师”和“尊师”

儒家认为, 为人师者是道德观念的评价者, 他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乃是一种人生的价值引导工作。因此, 在道德教育中, 教师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荀子·修身》说: “师者, 所以正礼也”, “无师, 吾安知礼之为是也?” 一个人如果没有君师的教化与法制的约束, 其本性之恶就会发展; 只有得到“师法”的引导才能够不断地积累善行而成为君子。

由于教师担负着“化性起伪”的工作, 教师本身必须是道德的楷模而又善于教导学生。“夫师, 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身》) “尊严而惮, 可以为师; 耆艾而信, 可以为师; 诵说而不陵不犯, 可以为师; 知微而论, 可以为师。”(《荀子·致士》) 《礼记·学记》则指出: “凡学之道, 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 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为了有效地实施道德教育, 教师还需要贯彻正确的德育原则, 包括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学而时习之, 长善救失, 防微杜渐, 禁于未发, 循循善诱, 以身作则等。

另一方面, 儒家历来主张尊师, 给予“人师”很高的地位。荀子认为隆君师与事天地、尊先祖同是礼之根本, 把尊师重教与国之兴亡联系起来。“国将兴, 必贵师而重傅, 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 必贱师而轻傅, 贱师而轻傅则有快, 人有快则法度坏。”(《荀子·大略》) 作为受教育者应不忘教师的教诲之恩, “弟子通利则思师”。(《荀子·致士》) 孔子培养一大批弟子贤人而被后人奉为“至圣先师”。总之, 教师的社会地位是由其在教育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严师”与“尊师”是儒家德育思想的重要传统。

(四) 在道德教育方式与途径上, 儒家特别重视人的内心自觉和主观努力, 重视道德践履, 主张通过培养道德自觉意识并自幼实践, 使人人都能养成完美的人格

孔子提出“立志”、“自省”、“克己”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论语·颜渊》说: “为仁由己”。在《卫灵公》、《述而》、《里仁》诸篇中, 他要求“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提出“学无常师”、“择善从之”、“见贤思齐”等主张。认为道德教育通过自我反省, 最后须落实到行动上。“过, 则勿惮改”, “过而不改, 是谓过矣。”《论语·宪问》进一步指出: “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对于那些身居要位的统治者更需要经常修己正身。

儒家特别注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进行道德体验。《荀子·修身》说: “道虽迩, 不行不至; 事虽小, 不为不成。”荀子认为, “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 “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 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 只要遵行和积累这些伦理规范, “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 君子与小人能够相互转化, 关键在于其在道德上的“积习”。为了积善成德, 培养完美的人格, 儒家总结出一整套修身养性的方法。《礼记·大学》强调“慎独”, 使人在一切场合都能遵循儒家的道德准则; 还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发展模式。此外, 为了增强教育效果, 道德教育应始于家庭教育而贯穿终生。《颜氏家训·教子》提出: “父母威严而有慈, 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反之, “无教而有爱”, “骄惯已习”, “逮于成长, 终为败德”。

儒家德育思想从汉代以后逐渐占有统治地位, 对中国人的道德观念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 其功过得失后人有不同评价。虽然它曾使封建等级制度合法化, 不利于人的个性发展与竞争精神的培养, 但是, 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它又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 中国大学伦理教育的现实考察与未来展望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教育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中国大学教育出现西化取向。以人文教育为核心的儒家教育思想逐渐为科学教育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教育思想所取代。“华人教育的西化取向是百年来华人社会整体西化的一个构成部分”(金耀基,1997)。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大学教育的人文传统出现失落与断层。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大学伦理教育的新问题随之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大学正面临着伦理教育危机的困扰。

这种伦理教育危机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首先,从社会变迁来看,从闭关自守到对外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给大学校园伦理与道德教育带来巨大冲击。国门打开后,大学生的视野开阔,观念更新。现代社会中人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的变迁在大学生身上充分表现出来。过去那种与社会生活不相适应的简单化的伦理教育模式已难以解决现实伦理问题。同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法制不完善和道德建设滞后所滋生的社会腐败现象,不可避免地校园伦理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削弱了道德教育的效果。功利主义思潮开始渗入校园生活,影响师生的行为规范。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之风抬头。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淡化,师生人际关系趋于功利化和疏离。

其次,就我国大学教育自身发展逻辑而言,大学伦理教育危机也是长期以来片面强调专才教育的结果。自5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大学人文教育被严重削弱,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逐渐下降。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专才培养模式忽视通识教育,形成专业人才的畸形发展。这种现象在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后并没有改观。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专才培养模式所特有的人文素质缺陷突出表现出来,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对大学生的不满情绪增多,指责他们懂得做事而不会做人。大学生也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准官员”而降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自谋生路的“求职者”。学校和社会关注如何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大学生关注如何在公平竞争中选择良好的职业,这些都是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大学伦理教育中面临的现实问题。

其三,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来看,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越来越广泛,对大学伦理教育内容提出了新要求。科学昌明、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人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破坏、战争、科技犯罪、社会伦理失范、精神空虚等人类生存的严重危机。现代中国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乃至信息化社会过渡,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际关系趋于复杂,大学教育迫切需要解决各种新的伦理问题。面对科技发展所引发的诸多社会伦理问题,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都呼唤大学教育应该重振人文精神,使新一代大学生和那些掌握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赋有更多的人文关怀。为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克服伦理教育危机,发挥大学培育人才、传承和创新文化的基本功能。

在这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大陆高等教育界正在推进各项改革活动。自90年代开始,教育理论界广泛倡导素质教育,各校积极探索各种有效途径,提高大学生思想品质。目前正在调整大学培养目标,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善专业与课程结构,实行理工结合,文理渗透。一些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纷纷发展和加强人文学科建设。另一方面,为改善育人环境,

各高校结合实际,开展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作为潜在课程,涵盖着教育者的价值观、人才观、知识观、教育与教学方式方法,师生关系以及校园文化氛围等内容,在大学伦理教育中能够起到独特作用。大学作为社会文化的中心和高雅文化的殿堂,只有创造优美的校园文化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防止和减少消极文化因素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

同时,近年来在社会环境方面,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完善法制、强化职业道德规范和社会公德教育等举措,都为克服大学伦理教育危机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此外,世界各国大学加强道德教育的实践经验也为改善我国大学伦理教育现状提供了借鉴。自70年代初开始,欧美高等学校重新关注道德与道德教育问题,在其课程体系中,“实践伦理学与道德推理课程已逐渐渗入本科生的课程体系”,“有关个人生活与专业行为的伦理课程大量涌现。70年代后期,全美大学中这类应用伦理学课程已超过1000种。在德国大学的医学院、法学院等专业学院中也普遍设立了各种专业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课程。从性质上看,这种课程同20世纪初叶前的道德哲学课、哲学研究课的目的与方法是根本不同的。”(魏贤超,1995)在发展中国家,加强校园伦理建设也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如新加坡的义安工艺学院自90年代即提出以五大东方价值观,即敬老、自律、勤奋、正直与责任作为学生的院训。(张亚群,1993)

展望未来,中国大学伦理教育危机之中蕴含着转机。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提高对道德规范与道德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发扬传统人文精神,结合现实问题,改善伦理教育方式方法。在这里着重剖析以儒家伦理教育思想为主体的传统人文教育的现实意义。如前所述,儒家思想重视人的品德修养,确立“人道”原则与世俗规范,突出师德作用,强调躬行践履与人的主体自觉,这些都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儒家人文传统日益受到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视。80年代中期以来,传统文化热不断兴起,我国高校传统文化教学益趋活跃。目前,除了传统的文史哲专业教学之外,高等学校的许多专业普遍增设了大学语文、中国历史讲座、中国艺术欣赏、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华伦理讲座等一系列选修课程。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工作者认识到,应该“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的美德、教育思想与方法,以及文学艺术进入学校,进入课堂”。(桑书铎,1995)大学还利用自身学科众多、人才密集的优势,广泛开展传统文化研究;通过整理和挖掘传统文化资料,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转化为适合当代大学伦理教育需要的文化资源。同时,为了适应社会变迁,还需要培养大学生的开拓精神、应变能力、团结协作、参与社会的品质。

古人言:“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衣食足”与“仓廩实”,是道德教育的必要基础,离开这个基础谈论道德教育容易导致道德的虚伪性;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衣食足”未必自然就会“知荣辱”和“识礼节”,现实社会中“财大气粗”者不乏其人。其间还需要通过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培养人的道德自觉和提高人的品质修养,才能够使之“富而好礼”。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大众化已提上议事日程;台湾已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这就提醒我们,高等教育在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还承担着道德教育的使命。正如约翰·S·布鲁贝克所言(1982),大学职能之一在于“造就公众心灵”,“大学是美国生活中最为崇高、最少腐败的机构”,“没有什么机构能够占据大学这个已长久地注入了如此多的才智和道德影响的位置。”

21 世纪的中国大学作为一方“净土”应当成为社会道德的向导与楷模。

## 结 语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道德规范的不可或缺。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当今时代，大众传播媒介影响日益广泛，社会更需要稳定的道德基础。从孔子时代起，中国人就重视道德教育。这一文化传统值得我们加以认真总结。由于“任何一种教育理论，除了具有以人类共同经验为基础的普遍性之外，同时也具有它胎息于自己文化的特色，反映出自己社会的传统和问题”，（林祖贻，1987）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移植西方教育思想，建设校园伦理文化过程中，不应排斥中国教育传统，儒家伦理教育思想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我们需要研究和吸收包括儒家以及其它文化流派在内的伦理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外来教育思想与伦理观念，只有经过本土化并为中国传统道德标准所认同，才能真正成为中国文化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传统美德教育作为构筑心灵防线的社会基础工程，在 21 世纪的校园文化建设中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儒家人文传统的变革与创新将构成两岸大学校园伦理建设的共同价值取向。

## 参考文献

- 金耀基（1997）：现代性、全球化与华人教育，南京“华人教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打印稿。
- 魏贤超（1995）：欧美高等学校道德教育史考察，《高等教育研究》（武汉）第 3 期，第 76—79，101 页。
- 张亚群（1993）：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评析，《八桂侨史》第 3 期，第 38—41 页。
- 龚书铎（1995）：略谈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演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5 期，第 21—22 页。
- 约翰·S·布鲁贝克著（1982 年修订版），王承绪主编，郑继伟等译（1987）：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 林祖贻（1987）：海外华人社会教育发展的共同问题，载《亚洲地区华人社会教育事业的展望》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出版。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 忠